

从满文创制到满文出版传播的滥觞

章宏伟

(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 100009)

摘要: 满文创制为满文出版传播活动创造了条件, 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崇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户部关于禁止官民栽种和吃卖丹白桂(烟草)的通告, 雕印精美, 是现知存世最早的满文雕版印刷品。

关键词: 满文; 清代; 出版传播

中图分类号: K203;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42(2006)02-0151-07

一、清代满文出版传播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研究有清一代的出版史, 人们关注较多的都在汉文出版传播, 对于以满族人为主体的满文出版传播,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各种出版史著, 还没有一部曾经加以研究。就笔者所见, 只有黄润华先生对此有所研究, 他在《文献》1996年第4期和1999年第2期先后发表的《满文官刻图书述论》《满文坊刻图书述论》, 分别对清代满文官、坊刻图书的起源、发展、鼎盛、衰落各个阶段作过初步探讨, 这些成果又在他和史金波合著的《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满文部分中作了阐述。但从总体上说, 清代满文出版还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民国以来编制的几种满文文献著录目录, 为我们研究清代的满文出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兹将笔者所见略述如下。

在20世纪30年代, 李德启将国立北平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两家的满文藏书, 合编一目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1933年), 收录满文图书419种, 这是编纂我国少数民族图书目录的开端。

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合编的《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 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雍和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资料室、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等北京13个单位的满文藏书共814种合编一目。

《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1983年10月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内部印本)编者的话称:“收录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雍和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室、辽宁省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所藏满文书籍及极少部分满文档案。此外, 对1949年10月1日前的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所藏满文书籍中分别与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国大陆各馆藏本差异大或缺佚的, 也做了收录。”

黄润华、屈六生主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 是一部较齐全的全中国满文图书联合目录。该书《前言》称:“目录的具体编辑工作是从1977年开始的, 首先走访了北京各大图书馆, 查阅了大量满文藏书, 收集资料编辑了《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 1979年出了两册油印本。在此同时, 向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发出了调查满文图书的函件, 收到了48封回函。编辑小组又先后赴东北三省、内蒙古、江苏、浙江、上海和西南、西北一些省区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文献、探访古籍, 在此基础上, 编成了现在这样一部目录。”该目录“共收录了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48个单位收藏的满文图书文献一千余种”,^①虽然“比如西藏现存的满文图书资料, 因条件所限, 未能得到具体材料, 本目录只能付诸阙如”, 而且从目录著录的存缺中我们也能看到原有满文图书的佚失, 但“就总体而言, 本目录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有清一

收稿日期: 2005-02-20

作者简介: 章宏伟(1964-), 男, 浙江温岭人, 紫禁城出版社副编审。

代满文图书的概貌”。这就为清代满文出版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卢秀丽、阎向东编著,由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意在客观、全面地反映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图书,收录范围为:满文本、满汉合璧本、满蒙合璧本、满蒙汉合璧本、满蒙藏汉合璧本、藏回满蒙汉合璧本、满汉蒙藏托忒蒙维吾尔合璧本等266种。这些书为上起顺治七年(1650年)下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满文本之刻本、木活字本、石印本、铅印本和钞本。同种书不同版本者作为独立款目出现”。著录的内容有书影、书名项、著者项、版本项、稽核项和附注项、解题、检索号。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正式出版的、揭示一家图书馆所藏满文古籍的书本式目录,不仅全部著录内容都来自第一手,而且该目录还有诸多特点,该书序称:“第一,书名除汉文书名外,还有满文书名和满文书名的罗马字母的转写;第二,介绍著者;第三,介绍装帧形式、行款版式及所有序跋;第四,有一定深度的提要;第五,附有书影。总之,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每部满文图书的各方面情况,有助于读者了解这部书。”

据介绍,德国、日本、前苏联、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都曾编过满文图书目录,虽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只著录了日本渡部薰太郎编的《满洲语图书目录》及其增订本,但意大利乔瓦尼·斯达里(Giovanni Stary)编著的《满洲研究——世界联合论著索引》第一册首先著录的就是书目。

二、满文的创制及传播

满族起源于辽金时的女真。明人郑晓在《皇明四夷考》中说:“女真,古肃慎氏,在混同江东。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临朝鲜,北至奴儿干……元设诸府路领混同江与南北水达达及女真人。”到明代,便置海西、建州、野人三卫管辖其地。建州卫女真酋长哥帖耳的后裔塔失之子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诸部,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南)即汗位,国号大金。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继续扩张势力,改女真族为满族,于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受皇帝尊号并改国号大清。1644年,清灭明。

女真人初无文字,曾使用过契丹字,金太祖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字。《金史》卷23《完颜希尹传》记载:“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其后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

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此后,两种文字并行使用,为我们留下了《大金得胜陀颂碑》、《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以及摩崖、镜缘、符牌、印文、印侧等女真文材料。

金朝后期及其灭亡以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逐渐汉化,皆改操汉语,汉文,女真文字渐无人知晓。但在东北本土的女真人,仍然在使用女真文字,即使到了明代前期东北各卫,所的女真官吏向明朝进贡奏表,仍然应用女真文。现存的明代永乐五年(1407年)由四夷馆编辑的《女真译语》就是专门用来翻译女真语的。由于本土女真人的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所以,《明英宗实录》卷113记载:“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二月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直文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从之。”“达达字”即是“蒙古字”,可见,到15世纪中叶,女真文字已经失传,而改用蒙古文字了。

明代的女真人分为三部,即建州、海西和东海(即“野人”)。明代初期,建州女真几经迁徙,后来在浑河上游的苏子河流域(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定居下来。南迁后,建州女真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成为女真人中最先进的一支。

16世纪下半叶,建州女真又分为多部,各部之间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战争频繁。努尔哈赤(1559—1626年)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战争,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实现了建州各部女真的统一。接着又开始了征伐海西和东海女真与其他部族的战争,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奴隶主政权,建元天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这样,一个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崭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就逐渐形成了。

16世纪末叶,女真与汉、蒙古、朝鲜等民族的来往日益频繁,经济和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借用蒙古文字已经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于是着手创制满文。

早在1599年(己亥年,明万历二十七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文。^②《满洲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己亥年……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噶盖、额尔德尼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

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乎？（阿玛，父也）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③这段文字比较详尽地说明了满文创制前的语言情况，十分明确地指出满文创制时间为己亥年二月，即公元1599年2月。^④

满文的创制是满族文化史上的大事，它促进了满族社会的进步，扩大了与相邻民族的交往，为后来女真人的全面统一，建立“后金”政权以至入主中原起了重要作用。

额尔德尼、噶盖二人受命创制满文，成为满族历史上的第一代语言学家。额尔德尼（1580—1623年），《八旗通志》卷236儒林传（上）记载：“满洲正黄旗人，姓纳兰氏。生而聪敏，明习蒙古文，兼通汉文。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即以文学侍从。随大兵所至汉人、蒙古地，俱能以本地语言文字，传宣诏旨，招降纳款，著有劳绩，授副将世职。”1616年，努尔哈赤称帝，建立后金政权时，额尔德尼充当了重要角色。当时“太祖升殿，诸王臣皆跪，八臣出班进御前，跪呈表章，太祖侍臣阿东虾、厄尔得尼榜识接表，厄尔得尼立于太祖左，宣表，颂为列国沾恩明皇帝，建元天命。”^⑤额尔德尼曾被封为“巴克什”称号。“巴克什”满语为Baksi，汉译为“学者”、“儒者”。《八旗通志》称其为“文儒”，即有学问之人。后金至清初所封“巴克什”者甚少。天命八年（1623年），额尔德尼被告私藏东珠等物，“汗怒，命杀额尔德尼巴克什夫妇，遂尽杀之。”^{[1]（P472-474）}

与额尔德尼一起创制满文的噶盖，“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呼纳赫。后隶满洲镶黄旗，太祖以为扎尔固齐，位亚费英东。岁癸巳闰十一月，命与额亦都、安费扬古将千人攻讷殷佛多和山寨，斩其酋搜稳塞克什。岁戊戌正月，命与台吉褚英、巴雅喇及费英东将千人伐安褚拉库路，降屯寨二十余。岁己亥，受命制国书。是年九月，命与费英东将二千人伐哈达。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贰于明，将执二将。二将以告，太祖遂灭哈达，以孟格布禄归。孟格布禄有逆谋，噶盖坐不觉察，并诛。”^{[2]（P254）}也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

额尔德尼、噶盖于1599年所创制的满文即“无圈点满文”，亦称“老满文”。额尔德尼、噶盖如何依仿蒙古文创制满文，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老满文是用蒙古文字母记录满语语音，与蒙古文字相差无几，有些地方与满语不合，很难准确地记录满语。其缺点是：“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1]（P1196）}老满文仅使用了三十余年，保存至今的文献极少，仅存《满文老档》^⑥及少量金石铭刻。

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皇太极又命达海对旧字加以改造。^⑦“达海增添圈点，分别语气。又以满文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叶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一字。其用韵之巧，较汉文切法更为稳叶。”^⑧经过达海改进后的满文，臻于完善，^⑨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⑩自此，满文形体得以确定，其后二百余年再无改变。

有关达海（1594—1632年）的生平事迹，《八旗通志》中记载说：“大海巴克什，满洲正蓝旗人。世居觉尔察地方，以地为姓……生而聪颖，九岁即通满、汉文。初事太祖高皇帝，置在内廷机密重地，专司文翰。凡与明朝及蒙古、朝鲜词命，悉出其手。其宣谕诏旨，应兼汉音者，亦委命传宣，无不称旨。”他不仅改进了“老满文”，而且还翻译了一些汉文经典。“奉命译《明会要》及《素书》《三略》……（天聪六年）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未竣而卒。”“达海以增定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2]（P9238）}

满文由额尔德尼、噶盖创制，经过达海改进，形成一种比较可靠、完善的文字。它作为满族自己的文字，作为清代的“国文”在满族社会历史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促进了满族文化的繁荣，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满族文化人才，而且还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的满文文献，包括本文所要研究的出版文献。满文的创制为满文出版活动的展开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满文出版又反过来作用于满文这种新语言的发展，两者互为因果，在清代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

三、关外时期满文出版传播的滥觞

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发现关外时期的满文图书印本，现所见《满文老档》数量虽多，因属机要文书，皆秘藏于盛京内府，没有刊刻过。此时即使有译成满文的著作也未及刊行。就是汉文印本，存者也寥寥，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汉文木刻《后金努尔哈齐徽明万历皇帝书》是人们经常用以例举的图书，该本版口有鱼尾，纸张裁减和文字刊刻都比较粗糙，共45页，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清初印本。这是给辽东等地的汉人，用以宣传明朝失天命而后金得天命的，因而论者以为努尔哈赤早已懂得用印刷出版为政治服务。^{[3]（P2545）}并且论者往往一言以蔽之：清统治者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夺取全国政权，而将出版事业放在胜利之后发展。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庞晓梅研究员和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斯达理教授在法国巴黎 Musee Guimet 发现的该书的满文本，¹¹系用老满文书写，文字写于格内，版口无鱼尾纹，为白口，纸张与汉文本相同，共41页。从文中内容可知，该文印于天启年间（1621—1627年），即努

尔哈赤死前,¹²但其并非努尔哈赤给万历皇帝的奏疏。因而,乔治忠以为这份文书应称《努尔哈赤檄明书》比较妥当。¹⁴再根据文中所描述的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如萨尔浒之役等,可以排除今西春秋关于此文写于1623年左右的推测。在 Musee Guimet 发现的满文刻本应为最早的满文本。两种文字的檄文都写于辽东决战时期,主要观点是指出明朝对满洲的非正义政策使其失去天佑,而满洲的行为符合天意,文中引用19例中国古代历史及满洲发展的历史事件加以佐证。庞晓梅经过认真比较,发现在引用古代历史知识时,满文本或少译内容、或误解之,汉文本中的一些词汇在满文本中无对应词,故而认为满、汉文两个版本虽出自同一个时期,但是汉文本早于满文本,汉文本是满文本的底本。¹⁵

庞晓梅和斯达理的发现提供了关外时期满文出版物的实证。皇太极嗣位后,清初所颁历书也以刻本形式出现,因而可以断言:关外时期,满文出版活动已经产生,或许盛京便是满族地区最早的出版中心。

天聪三年(1629年)上谕:“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母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¹³是年夏四月,“丙戌朔。上命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威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¹⁴儒臣职掌既定,也有了工作场所,便产生了一个机构“bithei boo”,汉文音译为“笔帖赫包”,意为“书房”。天聪六年易名为“bithei yamun”,音译为“笔帖赫衙门”,但整个天聪年间,汉文仍以“书房”称之,到乾隆时修订《清太宗实录》,嫌“书房”过于俚俗,方改为“文馆”。文馆的建立为后来清代设立的国史馆、秘书院、弘文院及翻书房、档子房、起居注馆等机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达海(1594—1632年)有了四名笔帖式作为助手,不停地从事汉籍的满译工作。“其平日所译汉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俱成帙。”到天聪六年(1632年)七月,达海“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及《大乘经》,未竣而卒。”文中还记述“达海九岁读汉书,通晓满汉文义,自太祖以来,凡与明国、及朝鲜往来书翰,皆出其手,文词敏贍,居心醇厚,识解聪明……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通晓。惟我太祖天纵聪明,因心肇造,所行皆与古圣贤同符默契。达

海与额尔德尼应运而生,实佐一代文明之治云。”¹⁵《满文老档》关于达海的记载应该是《实录》所自出:(天聪六年)“满洲大军至摆斯噶尔地方驻营毕,游击职达海巴克什病故。六月初一日,得疾,至第四十四日,即七月十四日未时卒。未(末)年,三十八岁。达海自九岁始读汉书,通晓满汉文。自太祖至天聪六年,撰拟与明国及朝鲜往来书札,文词敏贍,居心醇厚,识解聪明……达海用满文译汉籍有:《万全宝书》《刑部(原档残缺)素书》《三略》。始译而未竣者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昔满洲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达海巴克什始用满文译历代汉籍,颁行国中,满洲人不曾闻知之典故文义,由此通晓之。”^{11(P1322)}从《满文老档》所记载的九种译书中可以得知,这些书大都是在达海改进老满文之前翻译的,因为天聪六年正月改进老满文到他七月去世仅有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间是不可能连续翻译九本书的。达海所译诸书,大都采用的是老满文,正因为他有了大量的满汉翻译实践,才能够发现许多老满文无法明确表达的词语,并且胜任改进老满文的重任,设计了圈点和为翻译汉文所用的“十个特定字母”。从这个意义上说,达海在改进老满文的过程中,满汉翻译方面的实践经验起了重要的作用。

嘉庆时礼亲王昭槿在《啸亭杂录》中讲:“太宗天资敏捷,虽于军旅之际,手不释卷。曾命儒臣翻译《三国志》及辽、金、元史、性理诸书,以教国人。”《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条称:“崇德初,文皇帝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可见1639年他还以满文译出《四书》,而所译《三国志》实为《三国志演义》。这是满族军事将领用兵的主要谋略书,也是一般人喜爱的读物。关于《三国演义》全译本的发行,《东华录》记载为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颁行满文《三国演义》”。达海之后,伊成额又译了《礼部会典》等书。¹⁶

在有关史料记载中,还提到了其他译本。《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天聪九年五月)二十日,汗召集三院书生曰:‘我观汉文书,虚伪之辞甚多,虽全览无用也。今宜于大辽、金、宋、大元四史内,其四国勤于求治国而祚昌隆,或所行悖逆而基业废坠,用兵行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妄,有关政要者,择录编译,以备常观览。至汉文《通鉴》之外,其他典籍所载,如交战几何,逞施法术之语,皆系虚妄。此等书籍传之国中,无知之人必信之。当停其编译……’”

天聪九年(1635年)五月,“己巳,上召集文馆诸臣,谕之曰:‘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辞,虽全览无益也。今宜于辽宋金元四史内择其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或所

行悖道,而统绪废墜,与夫用兵行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政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至汉文正史之外,野史所载,如交战几合,逞施法术之语,皆系妄诞。此等书籍,传之國中,恐无知之人,信以为真。当停其编译。又见史臣称其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殊不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称。今朕承天佑,为国之主,岂敢遂以为天之子,为天所亲爱乎?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则天命靡常,守足恃耶?朕惟有朝乾夕惕,以仰邀天鉴而已。”^{[9] (P305)} 翌年(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上御翔凤楼,集诸亲王、郡王、贝勒、固山额真、都察院官,命内弘文院大臣读大金世宗本纪。上谕众曰:‘尔等审听之,世宗者,蒙古汉人诸国声名显著之贤君也,故当时后世咸称为小尧舜。朕披览此书,悉其梗概,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乃知凡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此番往征燕京,出边,我之军威,竟为尔八大臣所累矣。故谕尔等,其谨识朕言。”^{[9] (P404)}

据此,除了上面提到的皇太极下令“当停其编译”的一些典籍和昭梿所说的一些“性理诸书”,我们不知所译何书外,清朝在入关前至少有十几种书已经开始翻译或译完。这些书籍译出后,以何种形式流传,有无专门的刻书机构,因无史料记载,又无当时的刻本存世,所以难有确说,但根据一些迹象推断,当时应有满文刻本图书刊印。既是“颁赐耆旧”,恐难以一一抄写,还是刻版印刷最为方便。那末,清朝在入关前有无刻本呢?回答是肯定的。清入关前已有汉文、蒙文、满文雕版印刷品。

汉文雕版印刷品传世的天聪四年(1630年)刊印的《七大恨誓诏》、《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前者刻于

天聪四年,^{[7] (P3)} 后者刻于天命三至五年,存23页,每页8行,行12字,字体拙朴,纸张粗糙,书名为后人所加。尽管此书残存23页,但书页所载刻工有8人之多,说明当时有一批专人从事刻书。

蒙文刻本有《军律》一书存世,此系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二十二日颁布,前缺,存19页,每页框高22厘米,长17厘米,高丽纸木板印刷。根据其内容和蒙古文字等特点,确认此书为清入关前刻本。^{[7] (P3)}

既然在入关前,后金已有了汉文和蒙文的刻本,那末作为满族自己的文字,如果没有满文刻本,那倒不是一件正常的事。事实证明,那时已有满文出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实物存在。该件满文雕版印刷品为崇德四年(1639年)六月二十六日户部关于禁止官民栽种和吃卖丹白桂(烟草)的通告,此件作品雕印非常精美,是现知存世最早的满文雕版印刷品。^[7]

注释:

- ① 该书编者虽自言收录满文图书文献一千余种,图书编号实际上也只是1015号,但由于该目录是按书列目,不论是稿本、抄本、写本、刻本,也不论有多少个刻本,都归于一目之下;甚至像每年刻印的《时宪书》,也都是按皇帝列目,一个皇帝历年的《时宪书》统归于一目之下,因而在研究清代满文出版时,显然是要打破该目录的编排,尽管稿本、抄本、写本等我们会撇在一边,但对于刻本我们自然要逐个列目,因而,现存清代满文刻本图书的种数也超过1000种。见章宏伟《清代满文出版编年》,待刊。
- ② 但《清史列传》卷四《额尔德尼传》载:“初,己亥年二月,额尔德尼奉命同理事大臣噶盖创立国书,噶盖奏曰:‘蒙古字传习已久,难以更制。’上曰:‘我国之语必译蒙古为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奈何以我国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语为易耶?’额尔德尼奏曰:‘更制之法,臣等未能明,故难。’上曰:‘无难也!以蒙古字合我国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矣。’会噶盖以事伏法,额尔德尼遵上指授,独任拟制。”(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第1册,第187页。)则是说满文之初创,出自额尔德尼一人之手。
- ③ 《满洲实录》(一史馆小黄绫本)卷三,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本,1986年11月,第1册,第110-112页。《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有同样文字。《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的文字如下:“二月辛亥朔,上欲以蒙古字制为国语颁行。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辞曰:‘蒙古文字,臣等习而知之,相传久矣。未能更制也。’上曰:‘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反以习他国之语为易耶?’额尔德尼、噶盖对曰:‘以我国语制字最善,但更制之法臣等未明,故难耳。’上曰:‘无难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国之语音,联缀成句,即可因文见义’

矣。吾筹此已悉，尔等试书之，何为不可？”于是上独断，将蒙古字制为国语，创立满文，颁行国中。满文传布自此始。”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本，1986年11月，第1册，第44页。《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天聪七年（1634年）十月记载：“昔父汗在日欲创制满书，巴克希额尔德尼辞以不能。父汗曰：‘何谓不能？阿字下合一麻字，此非阿玛乎？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吾意已定，汝毋辞。’于是，巴克希额尔德尼自将蒙古字编成书。此前无满字。巴克希额尔德尼乃一代杰出之士，似此贤者，今所无有。”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入关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天聪朝、崇德朝），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2页。[清]福格《听雨丛谈》卷十一“满洲字”条也有类似说法：“我满洲习尚骑射……其后龙兴鼎盛，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未尝有清字也。我太祖高皇帝己亥二月辛丑朔，始欲以蒙古字改制国书，乃谕儒臣额尔德尼、噶盖曰：‘汉人读汉文，凡习汉字与未习汉字者，皆能听而知之。蒙古人读蒙古文，虽未习蒙古字者，亦皆听而知之。今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始解，其未习蒙古语者，仍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国之语制字为难，返以他国之语为易耶？’二臣更请制字之法，太祖曰：‘阿字下合一麻字，非阿麻乎。额字下合一墨字，非额墨乎。吾筹之已悉，尔等试书之，何为不可。’额尔德尼遂与噶盖遵依睿谟，将蒙古字编辑连写，制为国书，创立满字，颁行域内。”汪北平点校，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本，1984年8月第2版，1997年12月湖北第3次印刷，第216页。

④关于满文创制时间，学界一般都依此说，如我国第一部铅印的《满语语法》即认为“公元1599年额尔德尼初创满文”，见季永海、刘景宪、屈六生编著《满语语法》，导论，第4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5月版。谢景芳《清代满族民俗政治化论析》文中以为“满族本民族语言文字创立于1615年”，似乎没有根据。谢文见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4月，第308页。

⑤《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故宫博物院，1932，第9页。《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云：“天命元年，丙辰，春正月，壬申朔……上升殿，登御座，众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侍臣阿敦、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额尔德尼跪上前宣读表文……”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本，1986年11月，第1册，第63-64页。

⑥到乾隆初年，对于《满文老档》的辨识已经困难，所以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二十一日，清高宗谕大学士、军机大臣鄂尔泰，加尚书衔、太子少保徐元梦曰：“无圈点字原系满洲文字之本，今若不编书一部贮藏，则日后湮没，人皆不知满洲之文字，肇始于无圈点字也。著交付鄂尔泰、徐元梦，阅览《无圈点字档》，依照十二字头，编书一部；并于宗学、觉罗学及国子监诸学，各抄录一部，使之收贮可也。钦此。”（《无圈点字书·卷首》，转引自阎崇年《〈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办理钞本长编》，《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7月，第330-331页）鄂尔泰等的满文奏折中说：

“此档之字，不仅无圈点，复有假借者，若不详细查阅，结合上下字义理解，则不易辨（辨）识。今皇上降旨，编书收贮者，诚满洲文字之根源，永不湮没之至意。”于是，将《满文老档》中难以辨识的无圈点字全部检出，并附上有圈点之新满文，按十二字头排列，编辑成《无圈点字书》，以备查用。同时，将原档逐页托裱，装订保存。（转引自阎崇年《〈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办理钞本长编》，《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7月，第331-335页）

⑦《满文老档》天聪六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十七日……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字，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是以金国天聪六年春正月，达海巴克什奉汗命加圈点，以分晰之。将原字头，即照旧书于前。使后世智者观之，所分晰者，有补于万一则已。倘有谬误，旧字头正之。是日，缮写十二字头颁布之。”（中华书局本，第1196-1197页）据此“十二字头原无圈点”来看，在达海改进老满文之前，已存在十二字头。但是，关于额尔德尼初创满文的记载中，未见提及此事。《国朝耆献类征·达海传》中说“达海继之增为十二字头”，《清史稿·达海传》中也有“达海治国书，补额尔德尼、噶盖所未备，增为十二字头”（中华书局本，第9257页）之说，十二字头应是达海在改进老满文之前编创的。

⑧[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卷二百三十六，儒林传上，大海巴克什。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1989年5月第2次印刷本，第8册，第5325页。《国朝耆献类征·达海传》记载：“明年（1632年）三月（应为一月），详定国书字体。初，太祖指授文臣额尔德尼及噶盖创立国书，形声规模本体略具。达海继之增为十二字头。至是上谕达海曰：‘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达海遵旨，寻译，酌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协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清]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十），卷之一，宰辅一，达海传，第15页。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7）》，明文书局，1985年5月10日版，第541-542页，引《国史馆本传》。“康熙八年，任秘书院学士为达海请赐立碑，得旨：‘达海巴克什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字加添圈点，令其分明，又照汉字增造字样，于今赖之。念其效力年久，著有勤劳，著仍追立石碑。’”（同上，第136-543页。）

⑨据《满语语法》作者研究，“满族入关后的一段时期内，即顺治朝和康熙朝前期，在官方文件和出版的书籍中，仍有若干不规范处，如不太注意圈、点的区别，有少数词仍按老满文书写等……从全局上看，这段时期的满文已经基本上规范化了。当时，满族刚刚入关，国家尚未统一，战事频仍，内部事务繁杂，要制定和推行新的政策，没有更多的时间顾及满文一事，存在上述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出版的清圣祖玄烨命博达礼等人编纂的满文分类辞书《御制清文鉴》中,满文的书写就完全规范化了。”见季永海等《满语语法》,导论,民族出版社,1986年5月,第22-26页。

⑩关于满文改进的时间,根据《满文老档》和清代史料的记载,是在天聪六年(1632年)完成的。《满语语法》作者指出,“《满文老档》中的那段上谕里,用的动词全是过去时制,可见满文的改进工作在天聪六年正月以前已经开始,并且已经初具规模。按理说,皇太极命达海改进老满文的上谕也应在此以前,然目前尚未发现。”见季永海等《满语语法》,导论,民族出版社,1986年5月,第8页。达海于天聪六年月初一日患病,七月十四日卒,足见新满文已于天聪六年上半年完成。至于何时开始推行,因为《满文老档》缺少天聪七、八、九三年,其他史料也未见记载,因此无法说出确切的时间。崇德元年的《满文老档》已出现新满文,可见其推行当在崇德元年之前。由于新满文推行的时间不长,运用还不熟练,所以崇德元年的《满文老档》是新、老满文并用。《满语语法》作者在研究现有的满文文献后得出结论:“从新满文开始推行,到崇德末年已基本上完成,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见《满语语法》导论,第20-24页。

11 [俄]庞晓梅, [意] G. 斯达理:《最重要科学发现之一:老满文写的〈后金徽明万历皇帝文〉》,见阎崇年主编《满学研究》(第六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这篇文章的简体字汉文本收录在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6-296页。

12 [俄]庞晓梅, [意] G. 斯达理在《最重要科学发现之一:老满文写的〈后金徽明万历皇帝文〉》的结论中说:“这篇文本是努尔哈赤在17世纪20年代写给辽东地区汉族居民的,文章本身写成的时间大约是在1636年左右,以颂扬清朝的缔造者和神圣的统治者努尔哈赤为目的写成。”这个结论本身就是矛盾的。[俄]庞晓梅《满汉文〈努尔哈赤徽明书〉何种文字稿在先》才有了现在这样明确的结论,见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8月。

13《清太宗实录》卷五,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本,1985年6月,第2册,第73页。《清史稿·太宗纪》天聪三年(1629年)八月己亥,太宗谕曰:“自古及今,文武并用,以文治

世,以武克敌,今欲振兴文教,试录生员。诸贝勒府及满、汉、蒙古所有生员,俱令赴试。中式者以他丁赏之。”中华书局本,1976年7月,第2册,第27页。

14《清太宗实录》卷五,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本,1985年6月,第2册,第70页。其下文曰:“初,太祖制国书,因心肇造,备列轨范。上躬秉圣明之资,复乐观古来典籍,故分命满汉儒臣,翻译记注,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己躬之得失焉。”

15《清太宗实录》卷十二,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本,1985年6月,第2册,第167-168页。《清史稿》记载:达海,“隶满洲正蓝旗……九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属草……旋命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天聪六年)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皆未竟。”被“满洲群推为圣人”。中华书局本,第31册,第9256-9258页。

16 [清]弘昼,鄂尔泰,福敏,徐无梦等奉敕编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四十四:阿哈图“次子伊成额,当太宗文皇帝时,中试举人第一名。令在史馆行走,将《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文译汉,又翻朝鲜所奏表章,及《礼部会典》诸书。授司库,寻升吏部启心郎”。辽沈书社影印乾隆九年十二月初三日序本,1989年10月,第511页。

参考文献:

-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 满文老档:上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4] 乔治忠. 《后金徽明万历皇帝文》考析[J]. 清史研究,1992, (3).
- [5] [俄]庞晓梅. 满汉文《努尔哈赤徽明书》何种文字稿在先[A]. 朱诚如. 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C].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 [6] 清太宗实录:卷23[Z].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 [7] 翁连溪. 清代内府刻书图录[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阎现章]

The Origin of the Manchu Script System: From Formulation to Dissemination

ZHANG Hong-wei

(Published by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he formulation of Manchu Script System is a prerequisite for its dissemination and publication.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on 26 June, the fourth year of the Chongd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1639) was the first engraved printing work we could find now. It i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and states that it is forbidden to grow, use and sell danbaigui (a kind of tobacco).

Key words: Qing dynasty; the Manchu;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